

■ 历史研究

论贞元进士科试经验教训及其对 高考改革的启示

李世进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湖南文理学院 文史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贞元时期科举出身者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考试录取重视真才实学,为贫寒子弟考试创造了好的机会,许多考官尽量减少请托之风的干扰,使录取做到大体上公平,因而选拔出不少人才,此期的科举考试受到后代“知人”与“得人”的评价。与此同时,科举考试中请托的弊病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但还没有发展到恶化的地步。这一时期科举的经验教训给当前高考改革的主要启示是:高考改革坚持公平公正性应为核心诉求;在增加大学录取自主权时,如何有效减少请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贞元;进士科试;录取;高考;启示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3)02-0170-04

贞元为唐德宗使用的年号(公元785—805年)之一,共21年。范文澜认为德宗是一个有名的昏君“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一个昏君。”^{[1]198}安史之乱的爆发,削弱了朝廷的集权,而唐德宗刚愎自用,对大臣极度猜忌,对藩镇用兵连连失利,使藩镇问题变得严峻起来。在藩镇林立的情况下,朝廷已经没有力量自卫,更无能力消灭藩镇,但又离不开藩镇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支持。此外,宦官专权问题在德宗朝也无明显改善,依然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选官重要途径的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科)如何发展,是弊端丛生还是有所改善?联系当今现实,是否对高考改革有所启示?这些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根据清徐松撰《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记载,整理出贞元时期科举考试进士科录取人数,除贞元20年停贡举外,共考试20次,及第者523人,状元可考者15人,知贡举者12人。

—

下面根据相关文献,以知贡举者为中心,时间为序,对此期录取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力图接近此期科举真实面目。

(一) 鲍防、包佶

鲍防、包佶均有文名,擅长写诗,具有知人之誉。

《新唐书·鲍防传》(卷一五九):“贞元元年,策贤良方正,得穆质、裴复、柳公绰、归登、崔郾、韦纯、魏弘简、熊执易等,世美防知人。……防于诗尤工,有所感发,以讥切世敝,当时称之。与中书舍人谢良弼友善,时号‘鲍谢’云。”^{[1]4949-4950}

包佶为“吴中四士”之一包融之子。《唐才子传·包佶传》(卷三):“天宝六年杨护榜进士。……居官谨确,所在有声。佶天才赡逸,气宇清深,神和大雅,诗家老斫轮也。与刘长卿、窦叔向诸公皆莫逆之爱。”^{[2]476}

(二) 薛播、萧昕

薛播贞元三年知贡举,未毕事而卒,遂以萧昕代之并放榜。萧昕于宝应二年(763)、广德四年(764)、贞元三年(787)凡三知礼部贡举。

《新唐书·薛播传》(卷一五九):“播早孤,伯母林通经史,善属文,躬授经诸子及播兄弟,故开元、天宝间,播兄弟七人皆擢进士第,为衣冠光黻。累授殿中侍御史,迁武功、万年令。温敏而裕,与人交有常,李栖筠、常袞、崔祐甫并器之。……以礼部侍郎卒。”^{[1]4952}

《新唐书·萧昕传》(卷一五九):“昕始荐张镐、来瑱,在礼部擢杜黄裳、高郢、裴垕。其后镐兴布衣,不数年位将相,瑱为将有威名,黄裳等继辅政,并为名宰云。”^{[1]4952}

萧昕在录取时很可能考虑到人情的因素,据《唐摭言》

*收稿日期:2012-11-23

作者简介:李世进(1972-)男,湖北襄樊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卷八《遭遇》条记载,此年牛锡庶、谢登久登第乃赖昕之照顾。昕20多年未知名,门庭冷落,很少有举子干谒。牛锡庶、谢登久举不第,有一天误入昕府第,以为是来干谒的,非常高兴,盛情接待,复许以高第。昕贞元三年知贡举,果然践诺,二子遂登第。^{[3]1646}

(三) 刘太真

刘太真知贡举录取士子存在争议,《旧唐书》本传说他录取时偏向宰执姻族,方镇子弟,而裴度却有不同看法,认为是政治斗争波及太真,使其背黑锅。

《旧唐书·刘太真传》(卷一三七):“刘太真,宣州人。涉学,善属文,少师事词人萧颖士。天宝末,举进士。……性怯懦随。及转礼部侍郎,掌贡举,宰执姻族,方镇子弟,先收擢之。又常叙少游勋绩,拟之桓、文,大招物论。贞元五年,贬信州刺史,到州寻卒。……太真尤长于诗句,每出一篇,人皆讽诵。”^{[4]3763}

裴度《刘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五三八):“三年拜礼部侍郎,天下宾王之士,尚实远名者窃相贺矣。秉公心而排群议,履正道而杜私门,以为耸善兴能,试言考艺,若求虚誉、护小嫌,是全身之计,非取士之方也。乃贬抑浮伪,仍岁不回。适值时栋变更,朝柄夺移,怒不在公,而乃于公矣。”^{[5]5467-5468}

从裴度的评价看,刘太真对贬抑浮伪,扭转士风上还是有贡献的。事实上,刘太真在录取时确有可议之处。据《唐摭言》卷八《误放》条记载,包谊在应举期间无意间与刘太真发生冲突,太真甚衔之,在主考时欲使其不录,先黜落其杂文,后觉不妥,改为通过。“太真将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错愕趋出,不记他人,惟记谊尔。及谊谢恩,方悟己所恶也。”^{[3]1647}进士科录取中出现这种情况还不多见。

又据许志雅《王公(叔雅)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一三)记载,王叔雅的登第也与刘太真的重视与支持有关:“公讳叔雅,字元宏,太原祁人也。……郡举进士,才及京师,动目屈指,倾盖结轶。为礼部侍郎刘太真深见知遇。再举而登甲科。”^{[5]7321-7322}

(四) 张濛、杜黄裳

张濛,为一代文宗张说之孙,张均之子,也擅长为文。史书对张濛的记载很少,对其知贡举情况记载不详。

杜黄裳《旧唐书》卷一四七有传,《新唐书》卷一六九有传,然不言其知贡举事。

《太平广记》卷一八〇引《闽川名士传》记载其知贡举情况:“贞元七年,杜黄裳知举,闻尹枢时名籍籍,乃微服访之。问场中名士,枢唯唯。黄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某,他不能尽知,敢以为请。’枢耸然谢曰:‘既辱下问,敢有所隐?’即言子弟有崔元略,孤进有林藻,令孤楚数人。黄裳大喜,其年,枢状元及第。”^{[6]1340}可见此年录取还是参考了尹枢的建议,也说明黄裳还是留意于发现真才实学之士的。

此年录取的皇甫铸、令狐楚、萧俛先后位居宰相,可以看出张濛与杜黄裳知贡举还是选拔出不少人才。

(五) 陆贽

陆贽是唐朝著名的政治家、政论家。贞元八年知贡举,在录取过程中得到梁肃等人的帮助,所以此榜录取人才济济,被称为“龙虎榜”,梁肃等人的公荐之举也被传为文坛佳话。

陆贽在贞元元年十一月所作《冬至大礼大赦制》(《全唐文》卷四六一)中已经提到选士的标准问题:“致理之本,在乎审官;审官之由,资乎选士。将务选士之道,必精养士之方。魏晋已还,浇风未革,国庠乡校,唯尚浮华,选部礼闈,不稽实行,学非为己,官必徇人,法且非精,弊将安救?宜令百寮,祥思所宜,各修议状,送中书门下,参较得失,择善而行。”^{[5]4704}

他主持贡举可以说是把选人的标准落到实处。《旧唐书·陆贽传》(卷一三九):“(贞元)七年,罢学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肃,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惬,然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4]3800}

《唐摭言》卷八《通榜》条:“陆忠州榜时,梁补阙肃、王郎中杰佐之,肃荐八人俱捷,余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见《韩文公与陆修员外书》。”^{[3]1643}

《新唐书·欧阳詹传》(卷二〇三):“举进士,与韩愈、崔群、王涯、冯宿、庚承定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1]5787}

(六) 顾少连

少连在抑制贪冒、进献贤能方面作出了努力,得到时人的肯定。杜黄裳《顾公(少连)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七八):“登庸庸勋,权衡流品,抑贪冒而进贤能,所以代天工立人极也。……凡三典宾贡,三掌铨衡,藻鉴表于知人,清通播於令问,万邦辐辏,五都浩穰。”^{[5]4883}

不过,少连在知贡举期间也面临请托问题。《太平广记》引《感定录》:“贞元九年,顾少连自户部侍郎权知贡举,顾又未第。因潜往造焉。临放榜,时相特嘱一人,顾又落,但泣而已。来年秋,少连拜礼部侍郎,顾乃登第。”^{[6]1087}

(七) 吕渭

吕渭三次知贡举,然而不擅长知人,其录取举子时犹豫不能定夺,所出试题不当,使唐德宗不悦,因而黜落十人已及第者,自己也因遗落请托文记,被贬官。

《唐摭言》卷八“主司挠闷”条:“贞元十一年,吕渭第一榜,挠闷不能定去留,因以诗寄前主司曰:‘独坐贡闈里,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应见此情。’”^{[3]1643}

吕渭不擅长选文知人还有具体表现:据《唐摭言》卷八“已落重收”条记载,贞元十二年状元李程试《日五色赋》先榜已黜落。杨於陵省宿归第,恰巧在省门遇到李程,询问考试情况,程将所作赋给杨看,杨看后大为惊叹,认为状元非李程莫属。翌日杂文无名,於陵深不平,携李之《日五色赋》见吕渭,吕渭看完后认为非状元不可,最后才擢程为状元。^{[3]1649}

吕渭贞元十三年以“瑞柳”为赋题,试进士。此题目令德宗不悦,时相命减人数,遂在已登第者中黜落十余人。

《旧唐书·吕渭传》(卷一三七):“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未枯死,兴元元年车驾还京后,其树再荣,人谓之瑞柳。渭试进士,取瑞柳为赋题,上闻而嘉之。渭又结附裴延龄之子操,举进士,文词非工,渭擢之登第,为正中嗤鄙。因入阁遗失请托文记,遂出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在任三岁,政甚烦碎。”^{[4]3768}

此传记载“上闻而佳之”有误。据李翱《独孤朗墓志铭》(《全唐文》卷六三九)载:“(独孤朗)年二十一,与弟郁同来举进士,其二年,既得之矣,会有司出赋题,德宗不悦,宰相喻使减人数,故公与十余人皆黜。”^{[5]6449}

孟郊贞元八年、九年连续参加科试,皆未第。后来在韩愈等人的帮助下,于贞元十二年登第,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八) 高郢

高郢,三知贡举,在他的努力下,举子奔竞、请托之风得到很大遏制,士风有明显好转。

《旧唐书·高郢传》(卷一四七):“改中书舍人。凡九岁,拜礼部侍郎。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每岁冬,州府荐送后,唯追奉宴集,罕肄其业。郢性刚正,尤嫉其风,既领职,拒绝请托,虽同列通熟,无敢言者。志在经艺,专考程试。凡掌贡部三岁,进幽独,抑浮华,朋滥之风,翕然一变。”^{[4]3976}“志在经艺”说明考试录取标准侧重于儒家经艺,而不是传统的诗赋。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元稹集》)也记载了白居易登第的情况:“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元珠》《斩白蛇剑》等赋,泊百节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7]554}由于高郢严厉整顿考风,严格按考试卷面录取,因此,在其知贡举期间录取人数明显减少。

(九) 权德舆

权德舆为唐后期著名的宰相,曾三知贡举。期间,听取了陆贽等人的建议,加上韩愈的公荐,所以录取比较得人,但也遭遇权贵李实请托未遂的威胁。

《旧唐书·权德舆传》(卷一四八):“德舆生四岁,能属诗;七岁居父丧,以孝闻;十五为文数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名声日大。……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礼部贡举。来年,真拜侍郎,凡三岁掌贡士,至今号为得人。”^{[4]4002-4003}

《唐摭言》卷八“通榜”条:“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贽员外通榜帖,韩文公荐十人于贽,其上四人曰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纾,其次六人:张弘、尉迟汾、李绅、张俊余,而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弘、绅、俊余不出五年内,皆捷矣。”^{[3]1643}

李实曾向德舆请托,未达目的,威胁对其贬谪。《旧唐书·李实传》(卷一三五):“前岁,权德舆为礼部侍郎,实托私荐士,不能如意,后遂大录二十人,迫德舆曰:‘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德舆虽不从,然颇惧其诬奏。”^{[4]3731-3732}

二

吴宗国先生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中对中唐时

期科举的新特点有所探讨^{[8]174,158,268,224}。以下在吴著的基础上概括出此期考试的主要特点:

第一,科举在选举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贞元元和之际,大部分高级官员开始由进士出身者担任,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第二,诗赋在录取时的地位发生变化,以策文即文章好坏作为录取标准的潮流势不可挡。贞元年间,诗赋取士重新为文章取士所代替。而衡量策文好坏的标准,则和唐朝前期相反,主要是看内容而不是看词华。

第三,由于以上原因,这就给一般子弟特别是贫寒士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贫寒子弟的应举及第是贞元时期一个突出的现象。例如,奚易直、韩愈、王播、孟郊、白居易、侯喜等登第前生活均比较贫寒。

第四,进士考试后录取的名单往往不是根据卷面的成绩,而是根据应举者的声名和各方面的推荐,由主司决定的。声誉在录取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唐代科举考试之弊病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请托问题比较严重。请托之风始于武则天时期,玄宗朝进一步发展,中晚唐特别是元和之后达到高潮,由请托酿成的科场案在元和之后时有发生。贞元时期同样面临请托问题,不过大多数主考官还是与之作斗争,尽量减少请托对录取的干扰。

第二,掌握科举大权的主司未能根据试卷实际水平,公平精心判阅试卷,以致判卷有误,造成选人不当、考试不公。李程录取为状元的过程很能说明一些问题。首先,李程应考前未能有效制造名声,主考官对其不熟悉。其次,说明主考官判卷过程中很可能过目即忘,对李程的试卷没什么印象,否则不会出现“已落重收”之事。其三,说明主考官鉴别能力有差异,仅凭卷面成绩录取也有弊端。唐中期的行卷之风的盛行有其合理的因素,举子们通过行卷等制造名声宣传自己也可以理解。

比如,柳宗元就认为举子制造名声可以使主考官在改卷时(试卷不弥封)对自己多注意些,增加考中的机会。他在《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柳宗元集》)中说:“所谓先声后实者,岂唯兵用之,虽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夸丽,务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唯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以故少不胜。”^{[9]628}

第三,举子及其有关人员奔竞之风盛行,甚至伪造凭证等,以冀侥幸得逞;权势名望人物对进退举人有相当影响力,以权以情干扰主司录取工作。

贞元九年顾少连知贡举,当时宰相利用权势指定录取一人,致使李頔落榜。贞元十三年吕渭出赋题,引起德宗不悦,宰相就命减少录取人数。梁肃、韩愈利用自己的文名向有司推荐选人(当然,这被视为文坛佳话)等事例都显示出权势人物及社会名流对科举录取的影响。

上述弊端的产生,正如吴在庆先生分析的那样,大抵

与科举选人的某些措施办法有所关系。举其要者有：公荐、通榜、等第、试卷不糊名^[10]。

总体上看，贞元朝科举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大部分主考官对进士科的录取还是比较慎重，基本上做到“知人”与“得人”。这一时期考试也基本公平，尤其贫寒子弟应举是比较好的机遇期（元和之后就出现了孤寒与子弟之争）。虽然有种种弊病，但还没有发展到恶化的地步。科举在此期间能够平稳发展，与德宗朝昏暗的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三

当前高考从试题上看，已经呈现出全国统考试卷与部分省自主命题试卷并存的现象；从录取来看，主要还是高校在各省下达招生计划，分配招生名额，实行分省录取。这样，所谓全国统考，其实是省级考试，各省考生高考实际上是省内竞争，从而使考试的公平性受到质疑。近年来高考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扩大自主招生人数比例。中国大学以公办为主，尤其是重点大学，本应该给公民以平等的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在其实施自主招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请托（托关系）的影响，从而加剧教育的不公。中国目前处在各种矛盾高发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任何一种改革其公平公正性都是国

人关注的首要问题。最近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减少高考加分项目就是力图扭转加分中的请托、造假现象。如何最大程度上减少乃至避免请托现象的发生，实现改革的公平公正性，则关系到高考改革的成败。从这个角度看，研究贞元时期进士科考试的经验教训具有鉴古知今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2]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3] 王定保. 唐摭言[C]//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4]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5] 董浩.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6] 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7] 元稹. 元稹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8] 吴宗国.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
- [9] 柳宗元. 柳宗元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0] 吴在庆, 刘心. 唐代科场弊病略论——以中晚唐数次科场案为例[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4): 82.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Jinshi Keshi in Zhenyuan Period and the Enlightenments for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LI Shi - jin

(Institute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 Sichuan University , Chengdu 610064 , China;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 Hunan University of Art and Science , Changde 415000 , China)

Abstract: In Zhenyuan period (785 - 805) , the senior officials came mainly from the winner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 which paid more attention to admitting those who had true skills and genuine knowledge. This had created a good chance for the candidates from poor families. Many examiners tried to avoid being bribed as far as possible so as to make the admission generally fair. In this way , lots of talents had been selected ,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is period had been highly praised by later generations. But , of course , there existed some bribery to some exten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 yet not so deteriorated.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is period have thrown some enlightenments to the current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 follows: adhering to fairness and justices should be the core appeal for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 and how to effectively reduce bribery is an issue to be urgently solved , when colleges have more autonomy to admit students.

Key words: Zhenyuan; jinshi keshi; admiss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罗 渊)